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利维斯文学批评研究

孟祥春◎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非外借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利维斯文学批评研究

孟祥春 著

教育部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3YJC752015)
本书由 苏州大学优势学科建设经费 资助出版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维斯文学批评研究 / 孟祥春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8. 11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72-2528-2

I. ①利… II. ①孟… III. ①利维斯(Leavis, F. R. 1895-1978)-文学评论-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6142 号

书 名: 利维斯文学批评研究

著 者: 孟祥春

责任编辑: 汤定军

策划编辑: 汤定军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 - mail: tangdingjun@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 000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81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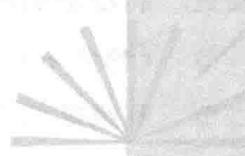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528-2

定 价: 5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目 录

● 导论 / 001

- 第一节 弗·雷·利维斯的生平 / 001
- 第二节 英国文学与批评传统中的利维斯 / 006
- 第三节 中西方的利维斯研究 / 017
- 第四节 本研究的缘起、思路、价值与基本内容 / 032

● 第一章 利维斯的文化批评 / 036

- 第一节 追忆逝去的乡村：“有机统一”思想 / 038
- 第二节 “少数人文化”思想 / 051
- 第三节 “技术功利主义”批判与“文学文化”的高扬 / 060
- 第四节 文学、教育与理想读者 / 067

● 第二章 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 / 074

-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本质、功能与标准 / 076
- 第二节 文学批评与理论及哲学问题 / 085
- 第三节 利维斯的语言观 / 095

● 第三章 利维斯的诗歌批评 / 103

- 第一节 利维斯“重估”英诗 200 年(17 世纪初—19 世纪初) / 104
- 第二节 英诗新方向的构建(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 / 118
- 第三节 利维斯诗歌批评的维度与得失 / 155

- 第四章 利维斯的小说批评 / 168
 - 第一节 《伟大的传统》与“伟大的传统” / 169
 - 第二节 利维斯的小说观及小说批评的
维度 / 179
 - 第三节 利维斯评判小说家 / 199
- 第五章 利维斯批评的定性、贡献、历史地位及当下
意义 / 232
 - 第一节 利维斯批评的定性、贡献与历史地位 / 232
 - 第二节 利维斯批评的当下意义 / 256
- 结 语 / 265
- 参考文献 / 270
- 附录一 / 280
- 附录二 / 282
- 后 记 / 284

导 论

第一节 弗·雷·利维斯的生平

弗·雷·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年7月14日出生于英国剑桥,比T. S. 艾略特(T. S. Eliot, 1888 - 1965)、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 - 1941)、D. H. 劳伦斯(D. H. Laurence, 1885 - 1930)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 - 1972)晚出生了十年左右。其父在剑桥经营一家自行车店铺,家境颇为殷实。利维斯在著名的佩斯私立学校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受到了以直接法教授古典希腊语而闻名的时任校长W. H. D. 罗斯(W. H. D. Rouse)的影响。利维斯颇具语言天赋,曾学习希腊语、法语、德语,晚年曾学习意大利语,试图读懂意大利伟大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 1896 - 1981)的诗歌作品。利维斯把英语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与精妙思想的载体与媒介,借此连接着过去与当下、现在与未来。他的这种思想或许与他的语言学习经历有着某种关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利维斯中断学业,毅然参军。但是,他不愿杀戮,只愿救生,于是加入了英军的“友谊急救队”(Friends' Ambulance Unit),成了一名担架手。他对战争和杀戮的反对出于他本能的良心,而非出于宗教理由,因为他继承了父亲有教养而世俗的世界观。当然,在自己的著作中,利维斯曾提及生活有其宗教根基,但这种宗教只不过是宗教信仰衍生的道德根基而已,或者准确地说,“宗教”在利维斯那里就是对生活的极端虔诚。利维斯在前线抬伤员时遭受过毒气侵袭,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那段战争经历不堪回首,利维斯极少提及,但它影响了利维斯的后半生,已经深入他的血液和骨髓,并深

深地镌入了利维斯的潜意识之中,这也促使他对当时的文化与文明进行批判,追寻健康的文化与人类目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当时在血雨腥风的战场,利维斯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袖珍的弥尔顿诗集,这似乎预示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进行的诗歌批评。

1919年,利维斯重返剑桥,后来在剑桥大学伊曼纽尔(Emmanuel)学院学习历史,一年之后又攻读剑桥的新兴学科英国文学,正式成为成立于1917年的英语学院的一名学生。英语学院的教员大多来自历史研究、古典研究等领域,由此可见,成立英语学院的目的便是以当代的批评视角去解读文学。

利维斯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背后有着诸多重要的传统。除了英国文学批评一贯的“求真”和“尚德”传统,有一些重要人物对其思想的催生作用不得不提,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等。除此之外,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I. A. 瑞恰兹(I. A. Richards)、T. S. 艾略特等作为批评家对他的影响亦不可低估,而他本人又影响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批评家。1920年,艾略特的《神圣的树林:诗歌与批评论文集》(*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出版以后,利维斯随即买回一本,潜心阅读。另外,他还受到了福德·麦道克斯·福德(Ford M. Ford)的《英国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的影响。利维斯从1912年的学生时代就开始订阅该杂志,并因此了解了D. H. 劳伦斯的作品《普鲁士军官》(*The Prussian Officer*)。福德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不可逆转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现状下,对“高等文化价值观”的关注必须局限于高校的群体,同时这种关注不能对“矫揉造作、昏庸愚蠢和审美主义(Aestheticism)的精神”做出丝毫的让步。^①这给利维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接影响了其“少数人文化”思想的诞生。这一理念也成了利维斯后来创办的《细察》(*Scrutiny*)杂志的思想基石。在剑桥的英文学院,利维斯受到了曼斯菲尔德·福布斯(Mansfield D. Forbes)、瑞恰兹等人的激发,于192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题为《新闻与文学的关系:英格兰报业的兴起与早期发展》(*The Relationship of Jour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in England Press*),主要探讨18世纪的英国文学,其中大量引证了约瑟

^① 参见 Edward Greenwood, *F. R. Leavis*, Burnt Mill: Longman House, 1978, p. 7.

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所创办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中的内容。一份期刊的精神基调不但能反映而且能塑造广大读者的文化与文学追求,利维斯对此十分关注。利维斯十分景仰爱德格尔·里奇沃德(Edgell Rickword)主编的期刊《现代文学记事》(*The Calendars of Modern Letters*)。该杂志1925年创办,1927年停刊。利维斯后来认为,这份期刊没能够赢得更多读者的兴趣与忠诚,因此归于消亡,这反映了文化的沦丧,而如何维持批评的标准便成了他后来主编《细察》的重要目标之一。《现代文学记事》认为当时一些著名作家的声望过于夸张,名不副实,如威尔斯(H. G. Wells)、巴里(J. M. Barrie)、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等。后来,主编里奇沃德把这些文章编成一辑,取名为《审视》(*Scrutinies*)。这也直接影响了利维斯,于是利维斯把1932年自己参与创办的期刊稍易名字,定为《细察》(*Scrutiny*)。

1927年,利维斯成了剑桥的见习英语助教,但不隶属于任何学院。他语言犀利、思维敏捷,讲座中常常一语惊人,吸引了众多学生,其讲堂每每爆满。教学之余,他经常在《剑桥评论》(*Cambridge Review*)发表书评。利维斯在剑桥地位卑微,“博士”成了利维斯的头衔,因为他穷其一生,也未能晋升到教授一职。学者和受教育的公众大多认为利维斯代表了剑桥的批评传统和精神,这与他的身份关联起来看,着实显得有些滑稽。更饶有兴味的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剑桥更加重视挖掘利维斯的批评遗产。2003年剑桥举行唐宁“重读利维斯”学术会议,2009年也有类似活动,2010年更是成立了“唐宁利维斯研究会”^①。剑桥的一位讲师在死后能获得这样的殊荣,实属罕见。

利维斯特立独行,且敢于打破陈规。他在伊曼纽尔学院教授英国文学,居然冒剑桥之大不韪,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禁书《尤利西斯》(*Ulysses*),这招致了剑桥与英文学院的极大不满。1930年,英文学院的图书管理员批准了禁止向本科生出借劳伦斯与帕维斯(T. F. Powys)的作品的规定,而利维斯当年就出版了名为《劳伦斯》(*D. H. Lawrence*)的小册子,向伟大小说家劳伦斯致敬。20世纪30年代,利维斯在讲授当代文学时,甚至开始教授瑞恰兹的学生威廉·燕卜苏(William Empson)的诗歌。在利维斯的课堂,学生们居然被教授自己

① 感谢“重读利维斯”大会的主席、“利维斯研究中心”的组织者克丽丝·乔伊斯(Chris Joyce)博士提供最新的信息。

同学的诗歌作品,这在剑桥是前所未有的“荒唐事”,堪称思想出格,行为乖张。利维斯敏锐的批评视角与卓尔不群的傲骨由此可见一斑。

在剑桥,利维斯也有幸运女神眷顾的时候。正如鲁迅 1923 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时赢得许广平的芳心一样,利维斯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在课堂上赢得了才华横溢的昆妮·多萝茜·罗斯(Queenie Dorothy Roth)的好感,并于 1929 年与之成婚,成为“一檐双笔,经文同心”^①的批评伉俪。利维斯夫人对利维斯的批评有着重要的影响,她小说阅读广泛,对女性作家尤为关注,利维斯对小说不断增长的兴趣当部分地归功于此,而利维斯小说批评的著作也有她的重要贡献,二人因此被称作“历史性的合作伙伴”^②。继利维斯 1930 年发表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及《劳伦斯》之后,利维斯夫妇在文学批评领域双双取得丰收,1932 年更是“奇迹之年”。是年,利维斯发表了《英诗新方向》(*New Bearings on English Poetry*),主要探讨霍普金斯(Gerard Hoppkins, 1844-1889)、叶芝(Yeats)、庞德、艾略特等人的诗歌,旨在发现英国现代诗歌的新方向;同年又发表了《如何教授阅读:埃兹拉·庞德入门》(*How to Teach Reading: A Prime for Ezra Pound*)。利维斯夫人则发表了《小说与读者大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利维斯还参与了《细察》的创办,而促成该杂志的创办是利维斯对英国文学批评的重大贡献之一。他在《细察》第 1 期发表了题为《文学大脑》(“The Literary Mind”)的长文,同时还有书评;第 2 期则发表专论文学批评的文章《批评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Criticism?”),追问当时文学批评的问题,他重塑英国批评的理想初露端倪;从第 3 期开始,他就成了主编之一,一直持续到 1952 年杂志停刊。正是利维斯给了该杂志以鲜明的特色与批评的基本精神,而他最重要的几部著作主要来自他曾在《细察》上发表过的评论。1933 年,利维斯发表《薪火传承》(*For Continuity*)与《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同年,他编辑出版了《通向批评的标准》(*Towards Standards of Criticism*),其中部分文章来自 1925—1927 年间《英国文学纪事》刊登的论文。1936 年他的重要著作《重估:英国诗歌的传统与发展》(*Revaluation: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出版,阐述

① 这是笔者为利维斯夫妇二人撰写的对联。

② 参见 P. J. M. Robertson, *The Leavises on Fic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了英国的诗歌传统,同时书写了英国诗歌的新历史。该书不是编年史,而是批评史,侧重于第一手的判断并对诗歌进行甄别区分。

1943年,利维斯发表《教育与大学》(*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1948年,他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该书堪称批评性的小说史,具有强烈的人生—人性—道德关怀,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1952年,《共同的追求》(*The Common Pursuit*)出版,涵盖了利维斯在《细察》发表的部分最有分量的文章。1955年,他发表《小说家劳伦斯》(*D. H. Lawrence: Novelist*),该书有大量的引文,又充满褒奖之词,从中可以看出劳伦斯思想与利维斯思想在很多方面的契合。此后的12年,利维斯并没有著作问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批评的消歇,而是蛰伏。1962年,他发表《两种文化?查帕·斯诺的意义》(*Two Cultu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 P. Snow*),直斥斯诺爵士代表的“技术功利主义”,大加弘扬“文学文化”与“文学主义”。其犀利、嘲讽、深刻和暴怒让英伦震惊,其影响在大西洋彼岸亦能感受到。英国各大报纸如《泰晤士报》(*The Times*)和美国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多次给予重点关注,“两种文化”论战成为当时的批评与文化盛事。1967年,他发表《安娜·卡列尼娜及其他论文》(*Anna Karenina and Other Essays*)。1969年,他的《我们时代的英国文学与大学》(*English Literature in Our Time and the University*)出版,探讨较为宏观的文化健康问题。同年,他与夫人赴美演讲,并发表《美国演讲集》(*Lectures in America*)。此后,他的批评热情与才思重新高涨,1970年与其夫人共同完成了《小说家狄更斯》(*Dickens: The Novelist*),1972年出版了《我的剑不会甘休》(*Nor Shall My Sword*)。1975年出版的《活用原理:英语作为一种思想学科》(*The Living Principle: "English" as a Discipline of Thought*)与1976年发表的《思想、言语与创造性:劳伦斯的艺术与思想》(*Thought, Words and Creativity: Art and Thought in Lawrence*)是利维斯的晚期著作,其中的小说与诗歌批评尤为老道。

正因为特立独行,利维斯在剑桥英文学院树敌颇多。他才华非凡,视角敏锐,并且创办《细察》,影响深远,居功至伟;有着深刻的文化与文明批评思想;弘扬了“英文学科”;臧否文学人物,使“文学批评”成为“显学”;重构了英国的诗歌史与小说史,其批评关注道德,肩负时代责任,充满人文情怀,深刻影响了英国批评图景。尽管如此,其卑微的地位一直未能根本改观,从1927年至1936年一直是一名“渺小的”尘埃

般的助教。1936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利维斯终于成了讲师,同年又成为唐宁学院的院士。但利维斯一生郁郁不得志,这或许是他后半生痛苦的又一根源。1960年,利维斯被聘为剑桥高级讲师,1962年从此职退休。1965—1968年,利维斯曾任约克大学客座教授(这也是2010年10月国际利维斯研讨会在约克大学举行的原因^①),之后又担任威尔士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被利兹大学、约克大学、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德里大学、阿伯丁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头衔。

1978年4月14日,利维斯溘然长辞,标志着一个更加多元的批评时代的到来。《泰晤士报》与《卫报》都刊登了利维斯的讣告^②,两相比读,十分精彩,可粗线条地了解利维斯的生平。在利维斯逝世的当年,他被英国王室册封为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r)。这对他或许是一种安慰。其实,“像他那样伟大的文化美酒,并不需要酒旗飘扬”^③。

第二节 英国文学与批评传统中的利维斯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利维斯的文学批评,相信学界不少人会毫不犹豫地祭出“道德批评”这张大标签。其实,这一标签很不全面,甚至十分偏狭(后文将详细论述)。但从另一方面讲,它很“方便”地传达了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对“道德”的倚重。要探讨利维斯的文学批评,“道德”或许是十分有效的起点。为此,我们必须把利维斯置于英国文学的创作与批评语境中审视他的个体与传统的关系,并以此为宏观背景,过渡他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在英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与批评中,“求真”与“尚德”是最为显著的两大传统,直到20世纪初依然如此。

① 克丽丝·乔伊斯博士给笔者发来邀请,并发送关于会议的详细信息和后续情况。

② 在中国,讣告除了告知死讯,还要颂其生平、功绩与美德,字里行间哀怨流露,但鲜有一字不尊,以告慰生者,并向逝者表达敬意。在西方的各大报纸,如英国的《泰晤士报》与《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等,其讣闻栏一般都由资深记者或专栏作家撰稿,讣告非但没有沉郁悲伤之气,反而往往轻松有趣。无关功利的读者多以愉悦的心情去阅读一个人的生平,正史与逸事编织,臧否功过,十分磊落坦荡。撰写者不需羞对死者,更不必愧对自己良心。对名人来讲,要上天堂,先上讣告。利维斯的讣告见附录2。

③ 见1978年4月18日英国《卫报》由John Ezard撰写的利维斯讣告。文中出现的引文,除了引自中文文献的部分,其余皆为笔者译文。下文不再逐条标明“笔者译”。

英国是“诗歌王国”，它的诗歌不仅吟唱夜莺与玫瑰、湖畔与田园、古希腊的荣光、英雄的壮举，也吟唱我们想象力所及的一切，但同时又处处守着或者创造着英国的诗歌传统。从英雄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诞生以来，英伦的土地孕育了难以胜数的伟大诗人，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古典主义时期的多恩、琼森、德莱顿、弥尔顿，18世纪的感伤诗人布莱克，19世纪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后期浪漫派的拜伦、雪莱、济慈，难以归类的柯尔律治、丁尼生、勃朗宁夫妇，20世纪初的叶芝、T. S. 艾略特等。与丰盛的诗歌相对应的是同样丰盛的诗歌批评。英国的诗歌批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诗歌批评家与诗人的身份往往是同一的。与丰盛的诗歌批评不同的是，英国的小说批评兴起得相对较晚，而且在20世纪之前总是略显单薄。在西方文学批评中，英国的小说批评长期以来一直不受重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可算是英国小说批评界的翘楚，但其“英国性”还是“美国性”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争论话题。T. S. 艾略特认为詹姆斯是属于两个国家的公民，笔者也认同詹姆斯民族身份的“双重性”。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断言：“英国在詹姆斯出现之前并没有自己的小说理论。”^①这一论断掷地有声，但有失偏颇。英国小说的批评史从严格意义上讲应始自1692年。是年，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发表小说《匿名人》（*Incognita*），该小说的前言被誉为“小说批评领域第一份重要文件”^②。若要寻根溯源，英国小说的批评源头可一直追溯到西方中古文论和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艺思潮，其传统之一便是“求真”，抑或说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妮特·鲁宾斯坦（Annette Rubinstein）认为，“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那些莎士比亚称之为‘能从现在洞察未来’的伟大作家的传统。未来总是在现在的心脏底下搏动着。因此，最贴近时代心脏的人也最能把握未来生活的脉搏。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也就是说，代表这一传统的作家能透过生活表面的无数漩涡和逆流，看到永不止息的时代主流，并密切加以关注。”^③这一论断较好地说明了英国文学，尤其是小说

① M. J. Hoftman,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of Fiction*, New York: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

② Irene Simon, *Early Theories of Prose Fiction: Congreve and Fielding*, in Maynard Mack and Ian Gregor, eds., *Imagined Worlds*, London: Methuen, 1968, p. 19.

③ [美]安妮特·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上卷），第1页。

的“现实主义”情结。对“求真”传统的阐述更为清楚的是殷企平的《英国小说批评史》，其中写道：

回顾 18 世纪以前的英国文艺批评史，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 - 322BC）的“摹仿说”在英国古典文论中一直占着主导地位——当然，亚氏的学说还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 500BC - ?）坚持的艺术摹仿现实的主张；在亚氏之后，该学说又由贺拉斯（Horace, 65 - 08BC）等人继承并发展。无论是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 1554 - 1586）关于诗是一种“摹仿的艺术”的论点，还是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著名的“镜子说”，无论是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 - 1700）在《悲剧批评的基础》（*The Grounds of Criticism in Tragedy*, 1679）中阐述的悲剧“永远有必要酷似真实”的观点，还是爱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 - 1719）、杨格（Edward Young, 1683 - 1765）、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 - 1784）等人对艺术作品必须真实地描写生活的本来面貌这一观点的认同，都表现出了一种倾向，即以追求真实为最高的创作艺术境界。这一传统深刻地影响了英国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小说批评，即使到了 20 世纪，仍然以各种形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①

从本质上讲，“求真”关涉的是小说家对小说文本与外在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英国小说家对“求真”的理解并非等同于追求僵硬的现实，或者认可小说文本与外在现实有着绝对的同一性。英国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小说家和理论家都以各自的方式阐释小说与人生、小说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英国小说的成熟发生在 19 世纪，但兴盛则始于 18 世纪。英国第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小说家非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 - 1731）莫属。他是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其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据信是以一个真实的事件为素材写成的。有一个苏格兰人塞尔柯克在一艘英国海船上做水手。1704 年 9 月的一天，塞尔柯克因与船长发生冲突，被遗

① 殷企平等：《英国小说批评史》，第 3—4 页。

弃在古拉丁美洲的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塞尔柯克从消沉失落到逐渐适应了岛上的环境与生活。他捕捉山羊做食物,用木头和羊皮盖了两间小房子,拿钉子做针,把破袜子拆开来做线,用来缝东西。他在荒岛上生活了四年四个月。1709年2月12日,塞尔柯克的命运彻底改变,一位英国航海家把他救离了海岛,他回到苏格兰后经常在酒馆里向人们讲述他不平凡的经历。后来,笛福就根据这个故事写成了《鲁滨孙漂流记》。正如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的那样,“编者相信,这部自述是事实的忠实记录,其中绝无虚构之处”^①。笛福把“真实”或者“呈现现实的世界”作为小说写作的原则,同时也表明,他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尚不深刻,远未达到“虚构”的层面,或者“标榜”真实本身就是一种小说策略。笛福后来的小说《辛格顿船长》(*Captain Singleton*)、《杰克上校》(*Colonel Jack*)、《罗克查娜》(*Roxana: The Fortunate Mistress*)、《伦敦大疫记》(*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一个骑士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Cavalier*)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作者的小说“现实”观。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有着较为系统的小说理论,他对小说定义、形式、读者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他延续了“再现说”,认为小说可再现古往今来、万象人生。他认为,《汤姆·琼斯》(*Tom Jones*)一书的真实性与外在世界相比并不逊色,该作品甚至可以称之为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拒斥虚构,恰恰相反,他认为真实必须与虚构相融合,才能造就小说佳作,吸引读者,使之陶醉。

英国小说创作以及批评的另一大特点则是浓厚的“道德批评”的传统。我们有必要先界定“道德”的意义。ethics(伦理学)一词在希腊语中是 ethikos,其字面意思关涉 ethos(希腊语,指“品格”与“气质”),而该希腊词 ethos 与英文词 ethos(社会习俗、习惯)密切相关。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曾用 moralis 这一拉丁词来翻译 ethikos。moralis 的字面意思与 mores(拉丁语,意为“作风”“品格”“风俗”“习惯”)相关。因此,从词源学上讲,“伦理(学)”与“道德(学)”是同一的,虽然从20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一种把伦理与道德区分开来的倾向。

“道德”可以指体现在文化和历史传统中的、支配人们的品格和行为的社會准则。道德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保持社会的和谐,虽然不同的

① Daniel Defoe, *Robinson Cruso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5, Preface.

社会道德可能会大不相同,而且同一社会不同时期的道德也往往差异巨大,甚至有互相冲突的可能。道德关涉正当、正义、公平、职责、义务、德性、价值、自由等人类的核心关注,同时也确立了相对稳定的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与规范。道德与伦理今天已经成为一门浩大的学问。“道德感”是利维斯的批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用词。它类似于美感,被认为是直觉性的、无关利害关系的官能,它使我们能够从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认识诸如善恶等道德性质。道德感能推动我们迈上道德上正当的和有德性的行为。道德是感觉到的,而不是推理得到的。^①

回到“道德”本身,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道德”一般有“描述性”与“规定性”两种用法。^②就其“描述性”意义而言,“道德”指的是一个社会或其他群体提出的或者个体所接受的行为规范;从其“规定性”意义上讲,“道德”指的是所有理性的人考虑到具体的情况所提出的行为规范。因此,所谓“道德的”是指能够评价为善或恶、对或错的人类行为。这些行为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是我们能够负责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道德上正当的原则,该行为就可以被称作“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或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抑或是“无关道德的”(amoral)。“道德”是人生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道德带来关于我们如何生活和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期望与规定。”^③由此,哲学家安东尼·卡宁汉姆(Antony Cunningham)说:“我们必须知道在人生中该做什么,不管我们是考虑人生的大手笔还是造就日复一日的生活的具体选择和行为。我们的选择、思想、经历和努力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塑造成此种而非另一种人。”^④

如果“文学即人学”成立,而“道德”又是人生的核心关注之一,那么文学与道德便有了必然的内在联系。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不认可“文学即人学”,也无论我们是否认可文学的“表现说”“再现说”“模仿说”,抑或其他样态的文学观,文学必然与“文学外”发生联系,而这种

① 关于“道德感”的阐释,参见 Nicholas Bunnin, Yu Jiyan, eds.,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01, p. 646.

② 参见斯坦福网络版哲学百科关于“道德”的条目。<http://plato.stanford.edu/search/searcher.py?query=morality> +

③ Anthony Cunningham, *The Heart of What Matters: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Mor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9-10.

④ Anthony Cunningham, *The Heart of What Matters: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Moral Philosophy*, p. 9.

联系必定关乎人的体验、情感、意趣、活动与生活,简言之,必定关乎“人生”与“人性”,因此又必然和道德发生联系。由此可见,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是内在的、必然的,因此无法割裂。欧洲自古就有重视道德的传统,重视文学与道德的姻亲,甚至“道德批评”欧洲雄踞 2000 年,成为主宰性的批评思想,直到 19 世纪以来,随着审美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它才逐渐式微。

在英国,绅士风度、骑士精神、公共的“善”“平等”“自由”“博爱”“正义”“道德责任”“宗教道德”等观念或精神都植根于欧洲浓厚的道德传统。也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中,英国才会诞生出盛极一时的“道德剧”,也才会诞生出英国小说批评的“尚德”倾向。需要指出的是,“求真”与“尚德”(即对外在世界的呈现与道德关注)在很多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身上往往也是合二为一的,纯粹的批评家直到 20 世纪才正式出现,利维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笛福的小说观除了“求真”,还有“尚德”倾向。他生活在资产阶级兴盛的时代,崇尚理性、追求“平等”“自由”“博爱”等新兴价值。《鲁宾孙漂流记》的主人公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和道德。同样,其《罗克查娜》的同名主人公不幸沦为妓女,却不愿沉沦、不愿丢掉人格独立,断然拒绝富商的求婚。在笛福看来,她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与此类似,《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的女主人公弗兰德斯,出身低贱,生于监狱,孩提时期被人收养。她生性善良而真诚,对生活充满了幻想。但她自小追求自立,渴望用诚实正直的劳动实现“贵妇人”梦想。可她命运多舛,为仆、遭奸、做妓、多嫁、私通、扒窃、入狱、发配弗吉尼亚。流放 8 年后,弗兰德斯最终成为诚实的妇人,生活富足,并真诚地忏悔以前的罪恶。笛福认为弗兰德斯对社会的抵抗同样有着深刻的道德寓意。笛福宣扬 17 世纪英国批评家莱梅(Thomas Rymer)创造的“理想正义”(poetic justice)一词,即文学中的扬善惩恶,但反对僵硬的说教。他自己的做法是通过人物形象呈现外在的现实,在叙事的过程中通过读者的情感和鉴赏力以一种“无言”的方式来完成小说的道德功能。

保守派作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 - 1761)以其小说《帕梅拉》(*Pamela*)一夜成名。他对婚姻道德问题十分关注,善写人物情感和心里,开创了此后英国家庭小说模式。同笛福一样,他也关注“理想正义”。理查逊把帕梅拉作为美德和正义的化身,从《帕梅

拉》的副题“美德有报”便可窥见一斑。理查逊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集叙事样式、情节、人物和道德主题于一体的文学结构”^①。在《帕梅拉》的前言,理查逊列出了小说的诸多益处,多为言行规范与道德教诲,包括父子职责、钱财观、倡导公正、珍视名誉等。正如王国维试图以美学来让20世纪初的羸弱国民坦然面对死亡一样,也如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一样,理查逊试图以小说为媒介对异教徒的时代进行改良,以让那些异教徒们走向温暖的基督怀抱,“在一种时髦消遣的幌子下悄悄加入基督教的伟大学说”^②。

亨利·菲尔丁十分“尚古”,推崇古典文论,这或许源于他早年上伊顿公学接受古典教育的经历。菲尔丁“尚古”的实质是“尚德”。他希望以道德改善社会,以达到和谐之目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谴责所谓文明世界的庸俗与虚伪,赞扬纯朴之人的良善。菲尔丁关于小说道德功能的论述常常被人引征,他说:“运用全部的才智与幽默,通过嬉笑怒骂拯救人们于惯常的愚昧和邪恶。”^③

在维多利亚时期(1836—1901),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在创造中融合悲剧与现实主义,其《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便是证明;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深刻反映了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描写了小人物的种种遭遇,如《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与《艰难时世》(*Hard Times*),开拓了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勃朗特三姐妹(C. Bronte, 1816—1855; E. Bronte, 1818—1848; A. Bronte, 1820—1849)短命却永生,通过传神地刻画人物描摹了社会现实;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 1811—1863)“真实”地描绘了1810—1820年间摄政王时期英国没落贵族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等各色人等的丑陋面貌和“丛林法则”,这集中体现在《名利场》(*Vanity Fair*)中;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的性格与环境小说力求还原真实的人生。他们显著的共同点就是注重再现社会现实,强调文学的功用,针砭时弊,教诲读者,而这往往是该时期小说家进行创作的或隐或显的目的之一。

19世纪的英国小说批评家逐渐走向成熟。但英国文学一脉相承的

① 转引自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196页。

②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第244页。

③ Henry Fielding, *Tom Jon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6, p. 436.